

17世纪英国烟草药用现象及其管制研究

李 静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原产于美洲地区的烟草被殖民者带入欧洲社会后逐渐成为民众日常药用品之一。随着药用现象的普及以及部分医学者的渲染,烟草药效被愈加夸大乃至神化,甚至伦敦瘟疫期间有人将它视作净化空气和预防瘟疫的良药。许多民众因此沉溺于它。一些理性人士基于此公开质疑烟草的作用并反思烟草带来的社会问题,最后引发了一场关于烟草药用及其效力的讨论。随着药用争论的发酵,王室政府也做出了回应。刚开始王室政府积极劝导民众减少吸食,引导烟草药用。然而当烟草成为一种大众消费品之后,尤其是在其财税价值愈加突出的背景下,其治理的重心发生了偏移。尽管王室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管制政策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但最终没有完成规劝之责,反而表露出将烟草垄断在王室及代理人手里,据此获取益之嫌。

【关键词】烟草药用;医疗问题;政府角色;专利许可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5)02-0027-13

Study on the Tobacco's Medicinal Phenomenon and Its Control in 17th Century England

LI Jing

(The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Abstract: As a native crop of America, after being brought into European society by colonists, and became one of the ordinary medicines of the European. With the spread of its medicinal phenomenon, and by many medical practitioners rendering, its role had been exaggerated and even deified, it led so many people was addicted to smoking. In this Case, Some rational man was beginning to suspect the role of tobacco and to think the social problems which it brings. In London, It had led to a debate about tobacco's medicinal and its potency. As the debated over the medicinal use of tobacco grew, the royal government was bound to respond. At first, the royal government was keen to persuade people to reduce their smoking and encourage the medicinal use of tobacco. But when tobacco became a mass consumer product,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creasing fiscal value of tobacco, the focus of tobacco control has changed. Nevertheless, the royal government did not conformed to the duty of persuading the people to reduce smoking in the end. In essence, this measures implied the purposed to monopoly the tobacco by the hands of the crown and its agents, and the purposed to get the benefits.

Key words: tobacco medicinal; medical problem; role of government; the patents

[收稿日期] 2021-11-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近代早期英国金融创新与资本主义的成长研究”(23ASS002)

[作者简介] 李静(1991-),男,世界史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烟草史、社会史。

引言

烟草是当今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一种“嗜好品”，在人们的认知里，它是一种成瘾性作物，会对身体产生有害影响。但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社会，烟草却是以药用形式出现，而非社交娱乐形式^①。从烟草进入英国至现代医学产生之前，它一直被许多民众当作一种药物，被想象或宣传成可以治疗各类疾病的“万灵药(Panacea)”。随着其药用的普及以及与国计民生的联系日益密切，英国统治者愈加意识到烟草的重要性，于是对其加以管制。

近年来，近代社会的烟草问题已被纳入到一些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有学者关注到民众关于“烟草是否具有疗效”或“具体疗效”的争论问题，如C.M. 麦克尼斯(C. M. Macinnes)认为尽管争论过程中不乏有人提出烟草有害的主张，甚至詹姆斯一世、查理一世、法国国王、罗马教宗等人还发起过禁烟行动，但最终没能阻止吸烟成为各个阶层喜爱的消遣方式^②。格雷丝·G. 阿特沃尔特(Grace G. Stewart)的工作更加精细，他根据整个西欧社会的烟草药用观念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的特征将其划分为“七个阶段”^③，并对1570年至1860年的烟草“药效范围”进行了详尽梳理^④。还有学者关注到烟草药用与消遣娱乐之间的关系，如肯·阿尔巴拉(Ken Albala)便犀利地指出，历史上所有刺激物和致幻物大抵都经历了从药用至消遣娱乐的转变，如早期人们掌握的酒精饮料到后来的烟草等，几乎都遵循了这一路径^⑤。桑德拉·贝尔(Sandra Bell)与肯·阿尔巴拉的观点相近，但其不认可转变一说，他认为烟草从进入欧洲开始便同时扮演着“神奇效力的药物”(Medicinal Drug of Wondrous Potential)与“社交调和剂”(Social Lubricant)两个角色^⑥。可以说上述国外研究相当具有代表性。复观国内，学者先后探讨过烟草传播、烟草种植业、烟草贸易以及烟草药用等话题^⑦，另有著述涉及英国的烟草管制话题，如王室禁烟活动^⑧、运输管制等^⑨。相较于国外，国内学者对该问题的关注还相对欠缺，少有学者关注英国社会对烟草药用现象的回应，尤其是王室政府在烟草药用问题中扮演何种角色。有鉴于此，笔者拟从英国统治者管制政策及其实践的角度入手，基于近代早期小册子、《王室敕令》《英国国家档案年鉴》等原始材料，在分析烟草药用现象的基础上，剖读政府针对烟草药用的管制政策，进而揭示近代英国的社会治理逻辑。

① G. L. Appers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Smoking*, North Charleston: Bibliolife, 2008, pp.13-14.

② C. M. Macinnes, *The Early English Tobacco Trade*, London: Routledge and Taylor&Francis Group, 1926, pp.27-50.

③ 七个时期分别为1492—1536年，1537—1570年，1570—1585年，1585—1600年，1601—1700年，1701—1799，1800—1860年。

④ Grace G. Stewart, A History of the Medicinal Use of Tobacco: 1492—1860, *Medical History*, Vol.11, No.3(1967), pp.228-268.

⑤ Ken Albala, Stimulants and Intoxicants in Europe, 1500—1700, in Carol Helstosky(Eds.), *The Routledge History of Food*, London, Routledge, 2014, pp.42-60.

⑥ Sandra Bell, The Subject of Smoke: Tobacco and Early Modern England, in Helen Ostovich, (ed.), *The Mysterious and the Foreig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8, p.153.

⑦ 张箭：《新大陆农作物的传播和意义》，科学出版社，2014年；蒋慕东、王思明：《烟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中国农史》2006年第2期；张红菊：《英属北美殖民地烟草种植园经济的兴起及特征》，《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黄光耀：《论“复辟时期”英国重商主义殖民原则的确立》，《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仲伟民、崔思朋：《近代全球化过程中烟草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求是学刊》2020年第3期。

⑧ 李隆庆：《新大陆的一份沉重礼物——烟草的发现、传播及其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

⑨ 赵秀荣：《1500—1700年英国商业与商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郭家宏：《从旧帝国到新帝国：1783—1815英帝国史纲要》，商务印书馆，2007年。

一、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烟草消费与药用实践

地理大发现促进了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的物种大交流、大尝试。近代早期,许多外来物种被引进欧洲社会后在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中常被当作药材使用,尔后它们逐渐融入欧洲社会文化中,直至成为大众化、日常化、全球性商品。

学者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指出,从17世纪开始,商业活动与殖民扩张塑造了一个互动的世界,在这个新局面里出现了混合的医学文化,新药物的提供和满足使得外科医生和药剂师开始成为医学领域新的实践者^①。欧洲人不断将各类植物、种子、树皮和果实带回欧洲并纳入其医学体系之中^②。以蔗糖为例,从它被殖民者带回英国社会开始,便深受民众嗜爱,并在这个过程中被当作一种药品^③。据一位日志家记载,将蔗糖与热牛奶、酒等混合,可用于治疗感冒^④。古柯碱也是新兴药品之一,作为一种内服药,其叶片可用于泡水或咀嚼,最大的药效是治疗肠胃紊乱,同时是治疗腹泻、胃痛、消化不良、痢疾、胃溃疡等疾病的备选之药^⑤。再如金鸡纳,它是17世纪中叶欧洲大陆治疗疟疾的药物,且被广泛应用^⑥。此外,西洋参、咖啡、可可等作物也成为常用药品之一。以上药用事实说明,现代医学发展起来之前新进物种常出现在民众的药用实践中。

与上述外来物种一样,烟草在近代早期欧洲人的药用实践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一种一年生的草本茄科作物,烟草喜湿热,对土壤有较高要求。其原本生长于美洲地区,野生品种达几十种,但被人工栽培和利用的只有两大种属:一为黄花烟草,植株小,在北美印第安人间栽种;一为红花烟草,源于今巴西内陆,后逐渐北移、东移,进一步传至中南美洲,成为后来主要消费的烟草品种^⑦。印第安人是烟草最早的种植者和吸食者,在欧洲人到来前,他们已有近2000年的栽培、加工史,近3000年的吸食史。烟草在美洲萨满教里是为人治病的良药,萨满巫医将其烟雾吹向病人,以图达到驱除病魔的效果^⑧。在美洲地区的各部落里,烟草药用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切罗基人(Cherokees)用黄油煎过的烟叶来促进伤口的愈合,易洛魁人(Iroquois)在蛀牙内放入烟丝,以减轻疼痛,秘鲁的吉瓦罗(Jivaro)、科尼博(Conibo)、坎帕(Campa)等部落利用烟草来治疗头疼和痢疾,委内瑞拉的部落用其治疗风湿^⑨。在中美洲烟草不仅可以治疗疾病,还可以预防疾病,如吉卡克人(Jicaque Indians)常通过嚼食烟草来预防传染病^⑩。

新航路开辟后,烟草被航海者引至西欧大陆,又于1565年由著名的海盗船长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引入英国,之后被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推荐给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及其朝臣。与西班牙、法国直接吸闻的方式不同,英国贵族更喜欢使用烟斗吸食。17世纪初随着烟草产量提高,抽烟斗的风俗习惯逐渐在英国普及,从贵族到平民,大家争相效仿,嘴里随时叼着塞满烟

① [英]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李尚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9页。

② [英]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第44页。

③ [美]西敏司著:《甜与权力》,朱健刚、王超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页。

④ Anne Clifford, *The Memoir of 1603 and the Diary of 1616—1619*, West Jordan: Broadview Press, 2006, p.123.

⑤ 张箭、刘佳:《美洲药材作物古柯的起源、发展与美洲的古柯业》,《中国农史》2020年第2期。

⑥ 张箭:《金鸡纳的发展传播研究——兼论疟疾的防治史》(上),《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

⑦ 英国殖民者约翰·罗尔夫将红花烟草与弗吉尼亚当地的烟草杂交,培育出一种植株更大的亚种,被称为“弗吉尼亚烟草(virginia tobacco)”,也就是常说的“oronoco”品种的前身。

⑧ Johannes Wilbert, *Tobacco and Shamanism in South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87-188.

⑨ Francis Robicsek, *The Smoking Gods: Tobacco in Maya Art, History, and Religion*,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9, p.38.

⑩ Francis Robicsek, *The Smoking Gods: Tobacco in Maya Art, History, and Religion*, p.39.

草的烟斗。查尔罗特(Charlotte Cosner)指出,烟草之所以越来越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人们的接纳或青睐,其药用价值助推了它在欧洲的迅速传播^①。直至1620年左右,它已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全球性作物了^②。据学者统计,1620年至1670年期间不列颠地区烟草的消费与进口量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增长,英格兰与威尔士每年人均烟草消费量从0.01磅增至1.1磅^③。进口量也随之大幅增长,“1618年预估有2万磅烟草被运至英国,接下来三年翻了一倍,1627年增加到50万磅,1639年为150万磅,1664年又急速增加到2375万磅”^④。烟草吸食逐渐跨越了所有社会阶层,克服了来自政府和教会尖锐甚至暴力的反对,跨越了所有法律和意识层面的障碍,成为民众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最开始它以药用的形式进入英国,据说可治一切病痛^⑤,随后在植物药学家和医学家的引介下,其药用更加合理化,成为日常药用品之一。在近代烟草最主要、最常见的一种疗法是排除体内不良积液或湿气^⑥。这种治疗理念反映了欧洲近代持盖伦理论的医学者关于体液调理的相关主张^⑦。该疗法在英国社会十分流行,如当时一位旅英的法国人证实,“英国人对烟草十分依赖,经常将其当作一种可排除体内积液的良方,毋论男女”^⑧。一位匿名人士更是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治疗过程及体验,由于身体无端地流出许多恶心的、黄的、腐臭的体液,于是他取来烟草吸食,吸食后不仅上述症状全然消失,还感觉胃部舒适,肺部顺畅,四肢有力^⑨。他还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吸食方式,即用烟斗吸食时滴上至少一滴植物油,这样味觉与嗅觉体验更佳。

伦敦瘟疫期间,有人曾使用烟草来预防瘟疫等流行疾病。据说在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30-1685)统治时期一位伊顿公学的学生“由于拒绝吸食这种可预防瘟疫的药物”而受到了最严厉的鞭笞之刑^⑩。海军大臣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也在日记中记载了他通过烟草预防瘟疫的过程,“有两三家门口挂着红十字,表示有人因瘟疫死亡,自觉身体些许不适,故马上买了一点烟草来吸闻和嚼食”^⑪。此外当时所有的医生、照顾感染瘟疫的人、搬运死者尸体的人以及这些职业以外的一些人都将其当作一种预防药^⑫。烟草凭借瘟疫期间的“良好评价”而备受民众信赖,据疫情下民众彼此之间的传闻,烟草能澄清空气,将引起瘟疫的毒“气”驱散,可对抗一切病毒与传染疾病,因此“伦敦烟草吸食者没有一个感染瘟疫”^⑬。

烟草成为海员等人群缓解饥渴或治疗肠胃不适的药品之一。大航海时代烟草成了那些长时间海上漂泊的海员的必备物品之一,据说他们脖子上常挂着一种用粽叶或其他草叶做成的小漏斗,里面塞满了

① Charlotte Cosner, *The Golden Leaf: How Tobacco Shaped Cuba and Atlantic World*,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3.

② [美]戴维·考特莱特:《上瘾五百年: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薛绚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③ Carole Shammas, *The Pre-Industrial Consumer in England and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79.

④ George K. Holmes, Some Features of Tobacco History, *Agricultural History Society Papers*, Vol.2(1923), p.396.

⑤ [美]J.布卢姆:《美国的历程》(上),杨国标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8页。

⑥ Wolfgang Schivelbush, *Tastes of Paradise: A Social History of Spices, Stimulants, and Intoxicant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 p.103.

⑦ 古罗马时代的医学家盖伦将体液分为黏液、黄胆汁、黑胆汁、血液四种,他认为有必要通过放血或服用泻药和催吐剂或其它排泄方式将不良体液排泄出来。

⑧ John Latimer, *The Annals of Bristol,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ristol: William George's Sons, 1900, p.360.

⑨ Dr. Bellamy *A New and Short Defense of Tobacco with the Effects of the Same, and of the Right Use Thereof*, London: V. S. for Clement Knight, 1602, C.3.

⑩ Francis Robicsek, *The Smoking Gods: Tobacco in Maya Art, History, and Religion*, p.39.

⑪ Robert Latham, William Matthews, et al, (eds.),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Vol.6,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120.

⑫ Guy N. Smith, *Tobacco Culture: A D. I. Y. Guide*, Hill Brow: Spur Publications Company, 1977, p.104.

⑬ [美]戴维·考特莱特:《上瘾五百年: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薛绚译,第88-89页。

烟叶,随手点燃漏斗尖的一头,然后把嘴尽量张大,从另一头猛吸散发出来的烟雾,海员们认为这样可抗饿解渴,驱除疲累,恢复体力^①。再如一位名为玛丽·凯默(Mary Kaymer)的女士在海上漂泊时,她本人及家人将烟草用于缓解不适感^②。殖民者本·琼森(Ben Jonson)宣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将烟草当作超过任何一种营养品的药物,最甚时他一人连续8个昼夜吸食了7磅之多的烟草^③。这种吸食习惯同样在伦敦的学生中流行,不少学生的书包里装着一只塞满烟叶的烟斗,作为早餐享用,课间休息时老师们还会拿出自己的烟斗向学生示范如何正确使用^④。不仅如此,人们还认为烟草可用来加速肠胃蠕动或催吐,尤其是出现积食时。一位匿名人士更是分享了自己的催吐经验,一次取三至五片烟叶,放入嘴里,慢慢地嚼碎,直至第四片或第五片时,将其吞到胃里,此刻将有翻腾、起伏、伸张、刺激之感,直到胃里所有东西都被催将出来^⑤。

烟草常用于去除体臭和异味。因此用餐后再吸食烟草成为英国社会的一种常态。比如,布里斯托地方年鉴便记载了“一些中产人士和上流人物经常在餐后使用烟斗吸闻烟草”的现象^⑥。其吸食方式是,通过烟斗吞咽烟雾或将烟雾停留在喉咙片刻,以达到除体臭的目的。大多数人都选择早餐后吸食烟草,但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则喜欢晚餐后一个小时吸食烟草,然后再去睡觉^⑦,或许是因为他认为烟草有助眠之效。除吸闻外,也有人用嚼食的方式祛除体臭,其方法是将烟叶置于酒精或烈酒中浸泡一夜,然后再食用,他认为这有利于短时间内降解、净化各组织器官的积液和各种形态的排泄物^⑧。

有人用烟草缓解身体疼痛和不适感。如教士拉尔夫·乔瑟林(Ralph Josselin)的一次自疗经历,当他发现自己的腿部因运动过多而出现疼痛感后,旋即“将一些青绿色的烟草叶子捣碎并敷抹于疼痛之处”“于是感到缓解了许多”^⑨。一位匿名人士则更加详细地介绍了他用烟草缓解疼痛的整个过程,他称自己以前是一个非常消瘦、虚弱的人,每晚大致12点至次日1点时会有严重咳嗽和盗汗,早上也被严重的咳嗽和淤痰困扰着,同时伴随着剧烈疼痛,当他使用烟草后,所有疼痛或其他不适感都奇迹般消失了,身体得到了解放^⑩。随着身体状况改善,他开始控制吸食频次,并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一套吸食习惯:第一周,每天抽一次,每次一烟斗;第三周,每隔三天抽一次,每次一烟斗……直至不适感消失。

除上述治疗实践和药用范围外,烟草还被广泛用于治疗虚脱、坏血病、鼻炎、流感、胸闷、涂抹新旧伤痕与溃疡等。随着印刷术进步,尤其是小册子等阅读载体的普及,这些“疗效”得以不断传播,且得到了诸如历史学家、植物学家、诗人的声援。据不完全统计,从烟草进入欧洲大陆开始至17世纪初,先后有60余部介绍烟草药用的著作面世^⑪。烟草的“疗效范围”也因作者们的不断宣传而增加,另据学者统计,1492年至1860年期间各类著作所宣称的烟草可治疗的病症达254种,其中有71种是该时期提出来的^⑫。这些小册子将烟草药用范围不断渲染并扩展,最终造就了烟草在民众心中“无所不治”的地位。

① [法]迪迪埃·努里松:《烟火撩人:香烟的历史》,陈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8页。

② John Bruce, Esq., F. S. A., et al. (eds.),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Series, 1635—1636, The Reign of Charles I*, London: Longman & Co., Paternoster Row, 1866, p.40.

③ G. L. Appers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Smoking*, p.45.

④ [法]迪迪埃·努里松:《烟火撩人:香烟的历史》,第27页。

⑤ Dr. Bellamy, *A New and Short Defense of Tobacco with the Effects of the Same, and of the Right Use Thereof*, D2.

⑥ John Latimer, *The Annals of Bristol,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ristol: William George's Sons, 1900, p.6.

⑦ G. L. Appers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Smoking*, p.112.

⑧ Dr. Bellamy, *A New and Short Defense of Tobacco with the Effects of the Same, and of the Right Use Thereof*, D2-D3.

⑨ E. Hockliffe M. A., (ed.), *The Diary of the Rev. Ralph Josselin 1616—1683*, London: Office of the Society, 1908, p.178.

⑩ Dr. Bellamy, *A New and Short Defense of Tobacco with the Effects of the Same, and of the Right Use Thereof*, C3.

⑪ Charlotte Cosner, *The Golden Leaf: How Tobacco Shaped Cuba and Atlantic World*, p.14.

⑫ Grace G. Stewart, A History of the Medicinal Use of Tobacco: 1492—1860, *Medical History*, Vol.11, No.3 (1967), pp.228—268.

二、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烟草药用之辩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伦敦地区爆发了一场关于烟草药用的争论,期间包括英格兰国王、法官和诗人等非医学出身的人都参与了进来。争论焦点是烟草是否真的包治百病,当时关于烟草疗效的看法主要分为三个派别:一是完全认可者,其认为烟草疗效广泛,无明显副作用;二是否定者,他们认为烟草并无疗效,反而对身体有明显伤害;三是部分认可者,他们认为烟草具有两面性。

支持药用的人极力鼓吹烟草的疗效,认为烟草可治疗多种疾病。17世纪的英国“烟草是以药用形式出现的,而非社交形式”^①。在不少人的认知里,它似乎可治一切病痛。据说“其因能治疗各种疾病而闻名,包括痛风、牙痛和水肿”^②。1571年荷兰人尼古拉斯·莫拉德斯(Monardes Nicolas)发表了一本名为《来自新世界的喜讯》的小册子,他在小册子中介绍了烟草的属性,盛赞烟草的医疗价值。1580年该书被翻译为英文版,受英国人追捧,对英国烟草药用观念的形成影响巨大^③。内科医生约翰·杰拉德(John Gerard)是最早的烟草药用号召者之一,他于1597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草药》的小册子,在书中极力为烟草的药用价值辩护,宣称可治疗许多疾病,包括偏头痛,较深的创伤等^④。为进行药用实验,杰拉德还尝试在霍尔本地区的花园里与医学院的花园里种植烟草,他根据所谓的医学实验和理论认为,秘鲁或特立尼达(Trinidadian)烟草最适合英国人体质,建议在本土引种。

药用者最为推崇烟草对于身体的调理作用,尤其是排除体内不良积液或湿气^⑤。这种治疗理念反映了欧洲17世纪持“盖伦理论”的医学者关于体液调理的相关主张。一些受此理论影响的英国医学者认为,烟草具有净化身体的作用,其干热属性可调理常年生活于英国这般潮湿阴冷环境下的身体。1599年亨利·巴特斯(Henry Buttes)在《干燥晚餐》中就曾建议人们进食后再吸食一些烟草,其依据是“烟草可消除身体腐臭味”^⑥。匿名作者在《关于烟草效用之新而短的辩护》中详细地介绍了烟草药用价值,认为吸食烟草可以促使身体排出许多恶心的体液,且对胃部、肺部以及身体各器官都有裨益^⑦。1612年威廉·沃恩(William Vaughan)医士在《自然和人工的健康指导》同样强调,季节变化时吸食烟草有利于调理肌体或治疗季节性疾病,尤其是春、秋潮湿的早上引发的各类疾病^⑧。此外,威廉·贝克莱(Barclay William)医士称吸食烟草是妇女去除体臭的一味良方,它可调节身体,去除妇女鼻腔和口腔散发出来的恶臭^⑨。以上皆属于盖伦体液理论在近代医学的复燃。

除上述症状外,亨利·巴特斯(Henry Buttes)医生还认为烟草对治疗流鼻涕、白内障、声音嘶哑、头痛有功效,对肺、胃、心脏等器官也有裨益,或在缺少肉食、饮料,失眠时,亦可用^⑩。威廉医生认为烟草“可治疗季节变化引发的眩晕、偏头痛、牙疼及感冒引起的鼻塞”^⑪。同时烟草被看成一种营养成分,若吸食得当,

① G. L. Appers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Smoking*, pp.13-14.

② Philip J. Stern, Carl Wennerlind, *Mercantilism Reimagined, Political Economy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and Its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17.

③ Monardes, Nicolas, *Joyful New out of the New found World*, London: Thomas Dawson, 1596, p.34.

④ Philip J. Stern, Carl Wennerlind, *Mercantilism Reimagined, Political Economy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and Its Empire*, p.123.

⑤ Wolfgang Schivelbush, *Tastes of Paradise: A Social History of Spices, Stimulants, and Intoxicants*, p.103.

⑥ Henry Buttes, *Dyets Dry Dinner*, London: Thomas Creede, 1599, A4.

⑦ Dr. Bellamy, *A New and Short Defense of Tobacco with the Effects of the Same, and of the Right Use Thereof*, C3.

⑧ William Vaughan, *Naturall and Artificial Directions of Health*, p.80.

⑨ William Barclay Mr. of Art, and Doctor of Physicke, *Nepenthes, Or The Vertues of Tobacco*, Edinburgh: Printed by Andro Hart, 1614, A8.

⑩ Henry Buttes, *Dyets Dry Dinner*, p.3.

⑪ William Vaughan, *Naturall and Artificial Directions of Health*, p.80.

可在没有营养补充的情况下维持十天左右^①。约翰·杰拉德(John Gerard)在1630年出版的《药草或种植者历史概述》中更是详细地描述了烟草的20多种疗效,包括胃病(胃寒)、肾脏疼痛、牙痛等疾病^②。烟草曾有“万能药”“灵丹妙药”“包治百病”等称号,足见烟草在近代欧洲人心中的药用地位。当代学者迈克尔·奇瑟尔(Michael Ziser)据此称“烟草进入欧洲的前五十年,(在民众心里)它不仅是一种与其他药物相区别的药品,更是一种‘灵丹药’或‘特效药’(sovereign remedy),是某种具有普遍的产生健康能力的事物”^③。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在长篇诗《仙后》中更是将它视作如同“仙草”一般的神奇之草^④。前文提到的巴克莱·威廉医生也称烟草为“神圣之草叶”,乃“珍贵植物”^⑤。教士及日志家拉尔夫·乔瑟林更是将其呼作上帝馈赠之物^⑥。烟草的药用价值被逐渐放大、神化,添入了浓厚的主观情感。

医学界人士之所以宣传药用价值,主要是因为烟草在医疗领域的经济价值。除此之外,航海者、进出口商人、殖民地种植园主、本土烟农等同样是药用支持者,他们积极宣传烟草的药用价值,因为同样是烟草药用产业的受益者。前文提及的沃尔特·雷利、弗朗西斯·德雷克甚至包括威廉医生在内,他们中不少人参与了烟草的生产、进出口及零售,是直接受益人。

然而,烟草过于夸大的疗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些人开始质疑所谓的“万能之草”。1602年一名匿名作者在名为《烟囱的清洁工作》的著作中反映,“事实上正如世上没有任何一种饮食方式适合所有人的身体、没有一双鞋适合所有的脚一样,没有任何一种治疗方式适合所有的疾病”^⑦。他进一步质疑了烟草自相矛盾的物理属性,“世界上哪有如此完美的植物”“哪可能有既热又冷、既干又湿、既急性又慢性的物种存在”^⑧。此文首次给予了所谓的“烟草万能说”以药理层面的质疑。不过其不足之处在于,该作者仍认可烟草的一些不实疗效。鉴于此,罗杰·马贝克(Marbecke Roger)以《驳斥烟囱的清洁工作》一文专题对烟草的多种虚假疗效提出了质疑,其称:“烟草不可能治疗如此多的疾病,它是否真能治疗坏血病、胃寒与胃虚、流感、鼻炎、浮肿,难道无所不能?”^⑨在罗杰眼里,烟草不仅没有理想疗效,反而还有负面作用,如“阻碍肠胃消化,减弱身体吸收营养的能力,消耗体热,影响生育,全然一味危险之药”^⑩。除此之外,有人还意识到吸烟对大脑的损害,一位名为密瑟尔登(Misselden)的吸食者就曾坦然承认,吸食烟草导致他“记忆力消退,变得健忘起来”^⑪。国王也参与了进来,1604年詹姆斯一世(James I, 1566—1625)在名为《反烟草》的小册子中尖锐地指责“烟草从印第安人那里流入基督教王国的同时那些罪恶的习俗也随之而来,它是一种臭气熏天且没有多大用处的杂草”^⑫。詹姆斯的这种看法,在国教会里深受认同。之后詹姆斯一世还资助了医学会的一些医生去专门研究烟草是否有药用价值。

对烟草药用的质疑与批评逐渐从药理层面上升到了社会文化层面。约书亚·西尔维斯特(Josuah

① William Vaughan, *Naturall and Artificial Directions of Health*, p.68.

② John Gerard, Rembert Dodoens, Iacobus Theodorus *The Herball or General Historie of Planters*, London: Adam Islip Loice and Richard Whitakers, 1633, pp. 359-361.

③ Michael Ziser, Sovereign Remedies: Natural Authority and the Counterblaste to Tobacco,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 - ly*, Vol.62, No.4(2005), p.736.

④ Edmund Spenser, *The Faerie Queene*, Vol.3,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6, pp.98-99.

⑤ William Barclay Mr. of Art, and doctor of Physicke, *Nepenthes, Or The Vertues of Tobacco*, A2, A6.

⑥ E. Hockliffe M. A. (ed.), *The Diary of the Rev. Ralph Josselin*, p.178.

⑦ Atkins, S. H. *Work for Chimny—Sweepers: Or A Warning for Tobacconists*, London: T. Este, 1602, B3.

⑧ Ibid.

⑨ Marbecke Roger, *A Defence of Tobacco: With a Friendly Answer to the Late Printed Booke Called Worke for Chimny Sweepers*, &c. London: Richard Field, 1602, B2.

⑩ Ibid.

⑪ Malynes Gerard, *The Center of the Circle of Commerce: or a refutation of treatise, intituled the circle of commerce, of the ballance of trade*, London: William Lones, 1623, p.11.

⑫ James I, *A Counterblase to Tobacco*, London: R. B. , 1604, B1.

Sylvester)将烟草视作地狱或恶魔的诱惑,其讽刺道,“吸烟者请你保持现在的样子,地狱之烟将因你更浓,你会因此无限地接近魔鬼,接近那不健康的烟雾中飞出来的魔鬼”^①。1627年作家弗朗西斯科·德·奎维多(Francisco De Quevedo)讽刺道,“罪恶的烟雾和罪恶的巧克力帮助印第安人报了西班牙人入侵的大仇”“烟草和巧乐力带来的伤害比哥伦布横渡大西洋造成的破坏还要大”^②。他是少见的批判欧洲的人,但也是地域文化歧视者。威廉(William Vaughan)在《自然或人为的健康指导》一书中记述了一首反烟草小曲,其中一段这样唱到,“烟草,奇怪之草,尔令人竭尽心力,沉溺于斯”^③。从社会文化视角来看,一些社会人士之所以如此反对烟草,是因为其背后透露着对印第安等非欧洲地区的文化与习俗的排斥。更有甚者将其与非洲人的肤色相结合,如克里斯汀(Kristen G. Brookes)在《吸入外来物:近代早期英国的种族与烟草》中说到,“早期英国人关心‘烟草对身体的暗色化’影响,尽管烟草来自美洲,但宣教的过程中,却常与非洲人联系起来”^④。将烟草与有色人种结合起来的的社会现象背后透露着殖民早期复杂且深刻的白色人种与深色人种、基督教与非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张力。或者也可以说,强行将深色的或黄褐色的烟草及其黑色的烟雾与人种联系起来,使一些人认定烟草的危害性,担心烟草会危及整个民族气质与人种完整性。总之,烟草的反对者多为保守人士,包括国王、法官、国教会教士、部分贵族、社会批评家、较传统的医生。他们反对烟草对社会文化带来的冲击,批评烟草、咖啡、啤酒等享乐主义消费形式,认为这些形式改变了英国的社会风俗,更是对绅士文化的一种挑战。对于统治者而言,烟草威胁到国民身体健康,一定程度上会动摇统治者的社会权威,影响统治秩序。

相较于前面二者的针锋相对,第三派的观点则更加中立。他们主张因时、因地、因个体情况吸食烟草,烟草有一定疗效,但不能过度吸食。1615年一位批评者称,“最近被引进英格兰、在烟草上涂抹浆果汁的吸食方法是有害的”“无故加的东西改变了它的属性与效能,使其变得不健康,甚至极其危险”“英国一半绅士及成千上万的人在一年之内或许会因此中毒”^⑤。另有人就烟草的适用群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詹姆斯·哈特(Hart James)告诫人们,烟草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易怒之人、头脑倾向于燥热的孩子、孕妇以及重病之人人都不能吸食烟草”^⑥。

中立者所批评的多半是过度吸食烟草。这一派看来,过度吸食或滥用烟草会导致精神错乱、不育、先天畸形及其它疾病^⑦。詹姆斯·哈特批评英国人“一天之内无时无刻不吸食这种药品,没有得到任何纠正,早上、中午、晚上,斋戒前或餐宴后,饭前或饭后,睡前或醒来,在家或在外,无论任何性别、年龄或其它情况,都不加区别的吸食着烟草”^⑧。不仅如此,包括吸食者在内的一些人士逐渐意识到烟草的致瘾性,不宜吸食过多。一位瘾君子无奈地表示,吸烟之习让人难以摆脱,没有它,难以渡过漫漫之夜^⑨。有

① Josuah Sylvester, *Tobacco Battered and the Pipes Shattered*, London: H. Lownes, 1617, p.84.

② Francisco De Quevedo y Villegas, *Discurso de Todos los Diablos o Infierno Enmendado*, in Marcy Norton (ed.), *Sacred Gifts, Profane Pleasures: A History of Tobacco and Chocolate in the Atlantic World*,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Introduction, p.3.

③ William Vaughan, *Naturall and Artificial Directions of Health*, pp.80-81.

④ Kristen G. Brookes, *Inhaling the Alien: Race and Tobacco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n Barbara Sebek, Stephen Deng, et al. (eds.), *Global Traffic: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Trade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from 1550 to 170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161.

⑤ C. T., *An Advice How to Plant Tobacco in England and How to Bring it to Colour and Perfection*, London: Nicholas Okes, 1615, A3. 当时英国流行在吸食烟草前在上面涂抹果酱或甜汁。

⑥ James Hart, *Klinike, or the Diet of the Disease*, London: John Beale, 1633, p.320.

⑦ Joel Best, *Economic Interests and the Vindication of Deviance: Tobacco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20, No.2(1979), pp.171-182.

⑧ James Hart, *Klinike, or the Diet of the Disease*, p.318.

⑨ John Bruce, Esq, F. S. A., et al. (eds.),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Series, 1631-1633*, London: Longman & Co., Paternoster Row, 1862, p.417.

批评者直接指出其副作用,过度吸食或滥用烟草会导致精神错乱、不孕不育、先天畸形及其它疾病^①。埃德蒙·吉纳德认为最好使用干燥的烟草来治疗头痛,而且它还有一个前提,即最好用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地方^②。他指出烟草的治病过程还有很多讲究,春季的时候人体常有黄疸、麻风、关节痛等疾病,此时人体需要将多余的液体排出体外,如果在适当的热量和温度环境下吸食,有利于排出多余的体液,故这个季节以药用为目的且适当的烟草吸食乃是有益的,只不过需要专门的人指导,如不加指导,乱用、滥用的话,反而会伤及身体,而夏季则不能吸食,秋季宜适当^③。这种观点在埃德蒙的另一部作品《身体与药物许可》中再次得到了印证。所以过度吸食问题已引起了许多民众(包括吸食者)的警觉。以上可知,中立者多为普通消费者、社会公知、理性医生、社会评论家,其中多数人都不是烟草传播的受益者,相较于前面二者,他们更加客观,更多是基于烟草的实际效力展开公正的论述。

总之,近代英国发起的所谓烟草药用问题的讨论更多是基于一种经验性质的论争,包括医生在内的专业人士并未清楚地了解烟草的属性,没有或缺乏实验医学的支撑。其争论背后是英国社会各界对烟草、咖啡、可可等外来商品的一次审视,更是不同利益集团围绕烟草展开的博弈。争论已超越了药用问题本身,也间接为之后英国统治者及其政府的管制提供了参考。

三、英国统治者态度及政府的阶段性应对措施

英国17世纪社会生活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王室政府的干预。如烟草问题,随着烟草的普及,王室政府不断根据自身利益与现实需要调适应对之策,由刚开始的放任、到全力禁止、再到纳入政府管制,最终形成较为系统的管制策略。

首先,放任阶段,大致为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这个时期烟草生产规模有限,进口量较少,因此只能用于治疗疾病,这种药用行为是民间自发行为,政府或统治者并不知悉。

早在1492年哥伦布船队就发现了烟草,并了解到其药用^④。1519年西班牙人开始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奴役印第安人种植烟草,1531年西班牙人又在海地种植烟草^⑤。之后几十年烟草行销欧洲各国,长期占据欧洲市场。与此同时,烟草药用现象从伊比利亚半岛传入整个欧洲,在英国与荷兰,烟草疗法更是倍受民众追捧^⑥。烟草以一种珍贵的进口药用用品的身份进入英国。航海殖民者是最早将烟草引入英国的群体。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等人很早就将烟草带回了英国,在人群中吸食。伊丽莎白一世宠臣雷利于16世纪80年代将烟草介绍给女王,并于朝臣中间展示^⑦。由于伊丽莎白一世吸食后感到胃部不适,因此对烟草没有好感。不过烟草却在宫廷和其他贵族之间流行起来,上层社会充当着烟草传播的主力,他们向民众展示,引得纷纷效仿,“优秀的医生、学识渊博和经验丰富的人、绅士及取得不俗成就的人,在其日常生活中都有吸食烟草的习惯,更加赋予了吸烟的合理性。”^⑧诚如菲利普(Philip J. Stern)所指,“烟草引进不久,便成为英国贵族消费者的

① Joel Best, Economic Interests and the Vindication of Deviance: Tobacco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20, No.2 (1979), pp.171-182.

② Gardiner Edmund, *Trail of Tobacco*, London: Mathew Lownes, 1610, p.17.

③ Gardiner Edmund, *Physicall and Approved Medicines, as Well in Meere Simple, as Compound*, London: Mathew Lownes, 1611, pp.11-14.

④ [西]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哥伦布评传》,朱伦译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98页。

⑤ 张箭:《新大陆作物的传播和意义》,第67-68页。

⑥ Francis Robicsek, *The Smoking Gods: Tobacco in Maya Art, History, and Religion*, p.39.

⑦ 荆玲玲:《近代早期美洲烟草文化的欧洲化》,《世界历史》2021年第2期。

⑧ Atkins, S. H. *Work for Chimney—Sweepers: Or A Warning for Tobacconists*, A1.

时商品”^①。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烟草之所以能在贵族中间流行,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统治者没有作出回应。

17世纪初期,只有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人才能购买烟草。上流人士在公共场所示范烟草吸食,于视觉上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通过优雅、讲究的吸食动作来彰显自己身份^②。要是某人收到或赠送他人烟草,那将是一件非常值得炫耀的事。如大臣尼古拉斯(Nicholas)在信中感谢船长约翰·佩宁顿(John Penington)的烟草和丝绸^③。之后佩宁顿又数次将上好的烟草送给尼古拉斯^④。1600年12月,伦敦市议员约翰·瓦特斯(John Walters)曾根据伊丽莎白一世大臣罗伯特·塞西尔的要求寄送烟草给他^⑤。以上可知,烟草传入初期英国统治者并不重视,至少没有将其视作一种社会问题并采取应对措施。

其次,只认可烟草药用的阶段,大致是1603年至1610年代,期间烟草药用减少,用于消遣享乐的行为不断增长,作为相对保守的天主教徒国王詹姆斯一世极力控烟。该时期英国殖民地刚建立,所产烟草有限,仍受制于进口的西班牙烟草,英国政府力图限制其进口量,促使民众将其药用。虽烟草的经济与财税效益逐渐显现,但统治者仍未意识到。

詹姆斯一世即位初期,其本人便十分反感烟草。以詹姆斯为代表的保守人士声称“纯正的基督徒绝不会接触这些撒旦的产物”^⑥,甚至认为吸食烟草的行为是在模仿印第安人的信仰,违背了基督教,他一度宣布与吸烟者势不两立,称烟草是“地狱之草”^⑦。据称沃尔特·雷利被詹姆斯一世关押并被处死,原因之一就是詹姆斯一世怨恨他将进口烟草带入宫廷,让其风行英国^⑧。之后同样是出于打压吸食者,詹姆斯一世将贵族司徒雷登发配至军营^⑨。“没有药用价值”的本土烟草受到了打击。1619年英国官方公布了一项专门调查公告,其称“根据医师团队的认证,英格兰、爱尔兰种植的烟草与正常气候条件下(美洲地区)生长的烟草不同,前者对身体有害。”^⑩于是至1619年,本土种植的烟草被定义为有毒物种^⑪。同时英国第一条本土烟草禁植敕令得以颁发,即1619年12月的《关于限制在英格兰、威尔士种植烟草的敕令》,其称“尽管有人试图为本土种植的烟草正名,使其形象变好,但它实际上对我们民众的身体和健康是有害的”^⑫,该文进一步指出,“之前我们禁止在伦敦及其周围种植烟草,但由于恶习在本土滋长,在王国内蔓延,带来诸多不便,因此有必要将禁令推广、普及。”^⑬哪怕是有“药用价值”的海外进口烟草,詹姆斯一世同样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压制,以确保被用于治病。1604年10月,英国政府向烟草征以重税,即在

① Philip J. Stern(ed.), Carl Wennerlind(ed.), *Mercantilism Reimagined, Political Economy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and Its Emp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23.

② Laufer, Berthord, *Introduction of Tobacco into Europe*, Chicago: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24, pp.33-35.

③ John Bruce, Esq, F. S. A., et al, (eds.),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Series, 1631-1633*, p.457.

④ John Bruce, Esq, F. S. A., et al, (eds.),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Series, 1634-1635*, London: Longman & co., Paternoster Row, 1864, p.235.

⑤ G.L. Appers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Smoking*, p.61.

⑥ [法]迪迪埃·努里松:《烟火撩人:香烟的历史》,第32页。

⑦ [美]戴维·考特莱特:《上瘾五百年: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第13页。

⑧ Arlenen B. Hirschfelder, *Encyclopedia of Smoking and Tobacco*, Phoenix: Oryx Press, 1999, p.256.

⑨ 史志诚主编:《世界毒物全史:毒物管理史》(第八册),西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26页。

⑩ Mary Anne Everett (ed.),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Series, 1619-1623, The Reign of James I*, London Longman & co., Paternoster Row, 1858, p.107.据考察,这是詹姆斯一世要求医师团队专门做的“针对英国本土烟草质量”的公开认证。

⑪ Philip J. Stern(ed.), Carl Wennerlind(ed.), *Mercantilism Reimagined, Political Economy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and Its Empire*, p.117.

⑫ James F. Larkin, C. S. V., and Paul L. Hughes (eds.), *Stuart Royal Proclamations, Royal Proclamations of King James I, 1603-1625*, Vol.1,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73, p.457.

⑬ James F. Larkin, C. S. V., and Paul L. Hughes (eds.), *Stuart Royal Proclamations, Royal Proclamations of King James I, 1603-1625*, Vol.1, p.458.

之前每磅2便士的基础上增加6先令8便士的额外税收(按吨位和手续费还应缴纳每磅两便士的补助金)^①。1605年为进一步抑制烟草的销售和过度消费,詹姆斯政府再次将烟草税提高^②。1611年再次对西班牙烟草征收相较于之前40倍的重税(与之前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相比)^③,即每磅6先令10便士的关税^④。以上可知,虽詹姆斯一世本人不愿意承认烟草的药用价值,但在其早期的政策中却尊重了民众的药用实践,其政府也没有完全禁止烟草,而是通过重税、打击本土“有毒”烟草等方式抑制其吸食量,以确保烟草只被药用。

再次,有限放开阶段,大致为詹姆斯一世统治末期,烟草药用逐渐减少,用于消遣的烟草吸食已经很普遍。如伦敦地区,1622年各大进口商品中烟草占总进口额的3.5%,仅次于水果、糖和胡椒等生活日用品^⑤。詹姆斯政府意识到烟草对于开发殖民地、增加政府财税的价值,于是尝试将烟草纳入政府治理,不再强制要求药用,只是加以引导。

詹姆斯政府开始正式颁布管制烟草的法令,有意垄断烟草进口、零售。1620年6月,《关于限制烟草无序的交易》告示民众,“我们打算将烟草的采购与运输权集中到有能管理烟草的少数人手中”^⑥。敕令颁布次日,王室便授予托马斯·罗宜(Thomas Roy)等人为期一年的烟草进口权,同时委托财政部专员商讨进口烟草所要缴纳的租金以及条件^⑦。1622年财政大臣又授予弗吉尼亚公司与巴巴多斯公司烟草进口许可,为期7年。1624年埃德温·桑迪(Edwin Sandy)爵士与萨默尔群岛达成烟草合同,获得该地烟草采购专利权^⑧。烟草采购权开始由王室代理人掌控。垄断专利还开始向零售环节扩张,如詹姆斯一世统治末期曾向代理人颁发烟草零售许可证,按照规定,持许可证的销售者们第一年向王室缴纳40先令的费用,之后每年缴纳6先令8便士^⑨。这些专利许可使国王意识到烟草的财税价值,即便如此,统治者仍强调烟草的药用价值,不希望民众过度吸食。1624年9月的《关于烟草的敕令》仍然强调本土烟草于身体有害,并要求“从1624年5月1日起,任何人或群体都不得在英格兰、爱尔兰、威尔士或上述附属之地种植烟草,不准保留任何烟草根或苗,一旦发现,将强制拔掉或破坏之”^⑩。该法令还强调,“任何售卖者一次不得持有超过一磅已加工好的国外烟草,不得将其夹杂、掺和到原产于(英属殖民地)弗吉尼亚和所摩尔地区的烟草中,以欺骗海关人员。”^⑪很明显统治者虽允许国外烟草进口,但限制了进口量。此举既在于打击竞争对手,也在于引导烟草药用。再以1619年弗吉尼亚与百慕大的烟草进口为例,其税费

① George Louis Beer, *The Original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System: 1578—1600*,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8, p.108.

② Arlenen B. Hirschfelder, *Encyclopedia of Smoking and Tobacco*, p.169.

③ [美]理查德·克鲁格:《烟草的命运》,徐再荣等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④ W. A. Penn, *The Soverane Herbe: A History of Tobacco*, London, Grant Richards,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02, p.207.

⑤ C. G. A. Clay, *Economic Expansion and Social Change: England 1500—1700,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25, 156—159.

⑥ James F. Larkin, C. S. V., and Paul L. Hughes (eds.), *Stuart Royal Proclamations*, Vol.1, p.482.

⑦ Mary Anne Everett (ed.),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Series, 1619—1623*, London: Longman & Co., Paternoster Row, 1858, pp.169—170.

⑧ W. Noel Sainsbury, ESQ., et al. (eds.),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Colonial Series, 1574—1660*, London: First Published by 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860, p.59.

⑨ Larkin James F. (ed.), *Stuart Royal Proclamations, Royal Proclamations of King Charles I, 1625—1646*, Vol.2, Oxfor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 p.415.

⑩ James F. Larkin, C. S. V., and Paul L. Hughes (eds.), *Stuart Royal Proclamations, Royal Proclamations of King James I, 1603—1625*, Vol.1, pp.600—601.

⑪ James F. Larkin, C. S. V., and Paul L. Hughes (eds.), *Stuart Royal Proclamations, Royal Proclamations of King James I, 1603—1625*, Vol.1, p.603.

为每磅6便士的关税与6便士的补贴(subsidy)^①。1621年英属殖民地烟草税上升到了每磅9便士^②。其直接后果是烟草销量暂时受到抑制。笔者认为,增加税收不全是为增加政府收益,也包含了詹姆斯一世本人对烟草的态度。从1619年的敕令的内容可知,詹姆斯政府尖锐地批评了有些人“将各种混杂的甚至对身体有害的烟草走私、夹带、掺和到成分优良的烟草之中,不加区分地出售出去,给民众带来了诸多不便”^③。因此,统治者并不愿完全放开烟草的吸食限制,反而注重控制其进口量、消费规模。

最后,全面放开阶段,大致时间是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及之后政府,此时烟草下沉至基层社会,用于消遣娱乐已是普遍现象,也成为政府的重要财税收入来源。该阶段统治者进一步挖掘烟草的财税价值,加强烟草进口、运输与零售的垄断,淡化药用方面的管制。

与詹姆斯一世相对遮掩的方式不同,查理一世更加公开地垄断了烟草的进口与售卖。1627年的《关于烟草的敕令》明确规定,“由专门指定的代理人负责进口海外烟草”^④。该敕令颁布后不久,亨利·李等人被委任为王室代理人,自每年米迦勒节后进口西班牙或国外烟草^⑤。又如零售领域,进入1630年代以后,查理一世政府采取了更为系统的零售管制。枢密院开始要求治安法官推荐各市镇适合销售烟草的人。同年萨摩赛特郡(Somerset)的治安法官就向枢密院提交了米勒威顿(Milverton)、金斯堡(Kingsburg)两地近百名适合零售烟草的人员名单。除指定销售者外,王室还指定了固定的烟草零售点,以约克郡(York)为例,该郡于1633年公布了哈利法克斯(Halifax)的3个固定零售点和零售商,布拉德福德(Bradford)的6个固定销售点,韦克菲尔德(Wakefield)地区的8个固定销售点^⑥。这一政策之后得到了法令保障。1633年10月公布的敕令便明确地规定,“治安法官以及相关人士须调查并认证那些适合烟草零售的地方,调查和认证适合烟草零售的人”^⑦。零售专利也带来丰富的财政效益,1635年6月美恩提思(Meantys)向财政部支付了其负责地区1633年3月至1635年5月的烟草零售专利费,共计10720英镑;同日威廉·卡恩(William Kabn)以相同的方式向财政部支付了其负责区域内1634年10月至1635年6月的烟草零售专利费,共计6042英镑16先令3便士^⑧。1635年6月美恩提思向财政部支付烟草零售半年租金5541英镑^⑨。

相较于詹姆斯时期,查理政府采取了更多措施以保障烟草垄断专利。比如,有专人负责烟草各类专利许可的颁发,合格的零售者须持烟草专卖许可证。而所有的烟草专卖许可证由王室代理人授权、颁发。查理一世时此权力长期由戈林勋爵(Lord Goring)把持,其签发后的销售许可证经枢密院认可后才生效。以沃灵顿市(Warrington)为例,该市的两名烟草销售者在获得了戈林签发的销售许可之后向枢密院递交了请愿才得到烟草零售权^⑩。最后更为关键的是,所有这些零售者和零售点每年都要向王室缴

① George Louis Beer, *The Original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System: 1578—1600*, p.111.

② Mary Anne Everett (ed.),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Series, 1619—1623*, p.289.

③ James F. Larkin, C. S. V., and Paul L. Hughes (eds.), *Stuart Royal Proclamations*, Vol.1, p.447.

④ Larkin James F. (ed.), *Stuart Royal Proclamations, Royal Proclamations of King Charles I, 1625—1646*, Vol. 2, pp.132—133.

⑤ John Bruce, Esq. and F. S. A., et al, (eds.),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Series, 1627—1628*, London: Longman&co., Paternoster Row, 1858, p.457.

⑥ Larkin James F. (ed.), *Stuart Royal Proclamations, Royal Proclamations of King Charles I, 1625—1646*, Vol.2, p.388.

⑦ Ibid.

⑧ John Bruce, Esq., F. S. A., et al, (eds.),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Series, 1635*, London: Longman & co., Paternoster Row, 1865, pp.160—161.

⑨ John Bruce, Esq., F. S. A., et al, (eds.),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Series, 1635*, p.114.

⑩ John Bruce, Esq., F. S. A., et al, (eds.),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Series, 1637*, London: Longman&co., Paternoster Row, 1868, p.153.

纳租金,有专人负责收取租金。比如,1635年王室任命威廉·卡鲁(William Carew)等人作为专门的收租人向烟草零售商收取租金^①。1627年王室还规定进口的国外烟草必须运到伦敦港接受检查,并盖印刻有箭矢和闸门标志的印章^②。同年8月,保罗·平达尔(Paul Pindal)等人获得授权去检查进口的烟草^③,只有经他们检查、标识、收费后才被允许流通。从上述政策措施可以看出,查理一世获得了巨大收益,再难看到与烟草药用相关的管制或劝导。

结 语

当前学界解释烟草药用现象的蔓延有“生物决定论”与“文化建构主义”两种主流观点。其一,吸食烟草后的生理反应让人自然与“药效”联系起来,如吸食后让身体不适短暂缓解、奇幻感觉麻痹了痛苦,致使吸食者错误地将其当作疗效,在医学水平有限的情况下难证其伪,而且不少医生本人就是药用的坚定支持者。诚然,这与近代医学状况离不开关系,在以细胞学、生物化学为理论支撑的现代医学产生之前,外科医生和药剂师更多是凭借个人经验来判断药物效力。即便有人尝试通过实验来检测药物属性,但效果有限。其二,随着殖民地烟草产量不断增加,不断下探的价格刺激了民众的消费需求,逐渐从奢侈品下沉为大众消费品,把更多消费者引向烟草药用实践,最终形成一种药用文化及社交文化。而且商业资本家也在精神文化层面烘托烟草价值,促使其大众化、资本化及商业化。最终烟草的药理与自然属性进一步被放低,商品属性、社会属性不断被发掘,并与经济生活、政治、财税深度捆绑。

于部分医生而言,推销烟草的药用价值本身就有利可图,他们有理由包装、泛化其药用价值,尤其是在烟草生产规模有限的时期。尽管所谓的“药用价值”遭到了詹姆斯一世以及一些医学人士的反,但他们没有足够的理由来驳斥吸食者。由于之前没有相关治理经验,且药用之外的价值还未充分展现,统治者的应对之策更多是基于家长制保护主义。然而当经济与财税的重要性逾越了道德劝诫必要时,烟草药用或享乐便不再是重要的参考项,家长制保护主义随之让位,其治理则走向法条化、官方化,政策颁行的基调也从医学范畴转向政治现实,尤其是经济与财政效益,政治与资本开始在烟草领域合流。

烟草领域形成的政府主导下的垄断式治理模式与英国政治特殊性密切相关。都铎王朝末期至斯图亚特王朝初期传统税源和财政制度已跟不上现实需要,开拓税源并建构新财政体系显得尤为迫切。随着烟草消费规模扩大,其商业、经济、财税价值提高,随之而来的则是政府管制的不断加强。而经济合作是社会精英与王权关系的重要纽带之一,国王及其政府是国家一切财源的最高所有人,精英们需要将自己与政府捆绑在一起才能获得照顾。同时政府也主要依赖包括烟草商在内的商人阶层,因为他们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支撑。于是通过专利许可等形式,政府将他们纳入到一个完整且排他的垄断经营模式中。因此统治者动用国家权力干预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史实中,既包含了一些向现代性靠近的趋势,又残留了一些与现代性对立的因素。统治者有意加强对商品的管理,进而增强国家财税收支的支配权,此举不自觉地推动了财税权向权力中心集中,财税权集中则为现代性政府的标志之一。然而,所谓的财政——军事国家还未建立起来,遑论现代财政体系,王室财政收支与国家财政收支仍交织在一起,作为国家公权的财政权仍为国王私有。这是近代国家治理转型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

(责任编辑:徐定懿)

① John Bruce, Esq., F. S. A., et al. (eds.),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Series, 1635*, p.43.

② Larkin James F. (ed.), *Stuart Royal Proclamations, Royal Proclamations of King Charles I*, Vol.2, pp.133-135.

③ Larkin James F. (ed.), *Stuart Royal Proclamations, Royal Proclamations of King Charles I*, Vol.2, p.163.